

瞿林东 著

唐代史學論稿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帝王論第一

皇帝

皇帝

皇帝

唐代史学论稿

瞿林东 著

北京

内 容 提 要

唐代史学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绚丽多彩的唐代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本书是作者近10年来研究唐代史学的成果，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唐代史学研究论著，举凡唐代史学之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和成就，唐代史学与唐代社会的关系，唐代史家在历史理论、历史认识和历史编纂上的贡献，唐代史学中直书与曲笔的斗争，唐代史家的层出不穷及其风格各异的治史特色、以及唐代史学在整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及其时代特点等问题，均有论列，其中多有创新研究和独到见解。本书可供中国史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政治史及隋唐史研究者参考，亦可供高等学校历史系师生及中学历史教师参考。

唐代史学论稿

瞿林东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875 字数：295千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200

ISBN7-303-00374-6/K·16

定价：5.30元

DA44/16

DA44/25
自序

我研究唐代史学，断断续续，不觉已经10年。这10年的学术生涯，不论从哪方面看，固不可以曹雪芹说的“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相比附；但以自己的愚钝，确也是窗前，灯下，酷暑，严寒，不敢懈怠，并非很轻松地度过来的。趁着本书的出版，我想讲讲我的认识过程和研究过程，也算是对自己这10年蹒跚而行的一个小结。

—

记得1977年春节后的一天，我去看望读研究生时的导师白寿彝先生。那时我还在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工作，我去向先生请教今后着重读些什么书。先生未假思索，嘱咐我还是读点中国史学史方面的书。尽管日月逾迈，人事代谢，我已经从事好几年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工作了，但我过去却是跟白先生学习中国史学史的，这个历史不会改变。于是，此次会面就成了我真正走上研究中国史学史这条学术道路的契机。

大约经过一年左右的调查和思考，我决定从研究唐代史学入手。当时作这样的抉择，是基于以下一些考虑：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高度发展时期，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等，都有名垂千古的大师和光彩夺目的成果。千余年来，对唐代文学（如诗歌、散文、传奇）、哲学（包括佛教哲学）、艺术（如书法、绘画、乐舞）的研究，代有其人，名家辈出，论著繁富。这种现象是令人兴奋的，它表明唐代文化确有其吸引人的魅力和奥秘。然而

兴奋之余，我也不免有一点隐隐的惆怅：史学，作为唐代文化的一部分，虽也有众多的史家和辉煌的成就，但人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却显得比较寥落。而前人之论中国古代史学者，或称颂马班，或赞扬魏晋，或褒奖两宋，似乎唐代除刘知几、杜佑以外即无足道者。从唐代文化研究来看，这显然是一个缺陷；从中国史学研究来看，这也未必不是一种偏颇。

这样的认识究竟对不对，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但当时确实是在这种认识的驱使下作出抉择的。顺便说一句，在作出这样选择的时候，我已年届“不惑”、人到中年了，然而在自己的学术履历表上几乎还是一纸空白。因为痛感失去的时间太多，所以在思想上就颇有一种作“背水一战”的决心。这是当时的心情。现在回过头来看，这“背水一战”的成果，原是微不足道的。

二

在研究方法上，我注意到两条：第一，先作编年。这是一种很笨的方法，但为了了解唐代史学发展大势，以避免在研究中顾此失彼，并力求在看法上的连贯性，还是硬着头皮先作编年。大约用了将近2年的时间，粗粗地阅读和浏览了七八十种书，编了一本《唐代史学编年》。通过作编年，大致了解了唐代史学的脉络，也发现了不少研究课题。第二，作双向考察。即一方面注意到从历史来考察史学，以避免就史学而论史学、对史学作孤立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注意到从史学去考察社会，以揭示史学的社会作用。应当坦率地承认，对于后一种方法，我是逐步认识到的；当初，只是因为我讲授过几年中国古代史，比较习惯地把历史同史学结合起来考察罢了。现在看来，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

从1978年年底我的第一篇研究唐代史学的习作发表时算起，至今恰是第10个年头。回顾这10年来的研究，有一个肤浅的感受，

就是不断地研究和不断地反省，这包含着对于研究客体和自身认识的探索。起初，我比较注重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选择的课题大多与此有关。后来我逐步认识到，这种研究因立意较高，固有其优胜之处，但若非建立在深入钻研的基础上，也极易流于空疏。于是乃转而有计划地研读一些史学著作，而于《隋书》、《南史》、《北史》、《史通》、《贞观政要》、《通典》等留意较多。通过比较认真地读书，再回过头来看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认识上又有所提高。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进而认识到，应对唐代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历史思想和唐代史学发展之总趋势作整体性的把握，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史学发展与历史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些规律性联系。近二三年来，我注意于这方面的思考和撰述，但这仅仅是开始。《礼记·学记》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学问这件事，也只有“在‘知不足’、‘知困’和‘自反’、‘自强’中才能不断有所长进。”

三

在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中，唐朝时期不仅产生了优秀的史家和杰出的著作，而且在不少方面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反映出史学发展所处的转折时期的许多特征。这些特征是：

——皇家正式设立史馆，主持修史，并一度显示出历史撰述上的优势；

——史学自我反省的开始和史家自我意识的增强，史学工作进入更加自觉的发展阶段；

——史学开始走向经世致用，增强了史家的社会参与意识；

——通史撰述日趋繁富，形式绚丽，是为中国古代“通史家风”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

——典制体史书的创立，扩大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的领

域；

——在天人之际、治乱兴衰、历史进程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认识，把自《史记》以来的古典历史理论推进到新的阶段；等等。

这些特征当然不足以概括将近300年的唐代史学的全貌，但至少可以表明它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这是我对唐代史学的第一点认识。

我对唐代史学的另一点认识，是它在唐代社会生活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说明史学之对于社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例如，唐高祖、唐太宗父子诏命大臣和史官撰写前朝史，用以说明“天下一家”政治统一局面的必要性；虞世南论“治乱之迹”，魏征以秦隋相较，他们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贞观年间最高统治集团制订政策的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作为门阀地主在政治上和婚姻上保持其特殊地位之根据的谱系之学，在唐代士、庶势力斗争消长过程中起了极其复杂的作用，同时也对唐代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影响；从盛唐到中唐都曾出现的关于“封建”的辩论，不仅在历史观上清算了所谓“圣人之意”的历史倒退观点，而且也在政治上阻止了分封制的重演；杜佑倡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的历史撰述目的，推动一代学风的变化；等等。这些事实表明，史学的社会作用是很广泛的，可谓“上穷王道，下挾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刘知几《史通·自叙》），而其重要者，也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历史的进程。

唐代史学在这两个方面的成就，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还是有一定的启发的。

四

辑入本书的23篇文章，按其所讨论的范围略可区别为二：一

是论述唐代史学发展大势或通论唐代史学之某一侧面者，凡7篇，集为上编；一是关于史家、史书和问题的专论，凡16篇，略按其时间顺序编次，是为下编。本书在内容上尚未能概括唐代史学的全部成就和问题，这是毋庸讳言的。同时，论点上的不够妥帖和材料上的不尽周全的情况，也是会存在的。尽管如此，作为这个领域研究之所得的第一本结集，它多少还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唯其如此，作者才不揣谫陋，把它奉献给读者。

最近10年，我国的历史科学事业有了长足的进展，我的这本小书，不过沧海一粟而已。我愿继续竭尽愚蒙之思，追随师友同志，跟着当代史学大潮前进。

1988年1月8日序于

北京师大史学研究所

目 次

自序.....	1
---------	---

上编

盛唐史学的总结性工作.....	3
中唐史学发展的几种趋势.....	18
晚唐史学的特点与成就.....	33
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	54
唐代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	61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	71
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	90

下编

隋唐之际的《汉书》学	119
《帝王略论》——唐初史论的杰作	124
说《帝王略论》的历史比较方法	142
令狐德棻和唐初史学	157
评《隋书》史论	173
《南史》《北史》散论	189
漫谈“八书”“二史”	201
读《史通》札记	216

论吴兢	227
韦述史学的成就与风格	244
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	249
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	267
说《通历》	291
韩愈与《顺宗实录》	306
关于《顺宗实录》的几个问题	316
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	329
后记	369

上 编

盛唐史学的总结性工作

从唐皇朝建立到唐玄宗开元末年的120多年，是唐皇朝的盛世，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之一。“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是这个盛世的两大高峰。这时期，唐代的经济、政治、民族关系、中外交流以及文化方面的各个领域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历史上罕与其匹的“盛唐气象”。这时期的史学，作为盛唐文化的一部分，其气势之大，创获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一 三篇修史诏书：对史学的新认识

唐初，从唐高祖到唐高宗，先后正式颁发了三篇修史诏书，对盛唐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三篇修史诏书是：

（一）唐高祖《修六代史诏》。

武德四年（621），担任起居舍人的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提出撰述前代史的建议。他指出：“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北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因隋末动乱，文献“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①由于唐皇朝统治者的先人在北周时地位显赫，而唐又是承隋而起，所以令狐德棻在建议中尤其强调了撰述周、隋两朝历史的重要性。

作为开国君主，唐高祖也深知修史工作的重要，因而采纳了令狐德棻的建议，并于次年下达了《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诏书

^① 《旧唐书·令狐德棻传》。

首先强调了史学的社会作用，认为：“司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① 这里讲的史学的社会作用的想法，虽非首创，但它出于皇帝的诏书，这在以往实不多见。诏书还对南北朝时期各个皇朝的历史作了总的评价，指出：“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这一段话，颇显示出唐高祖作为政治家的气度：他是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的胜利者，但他并没有去指斥前朝历史中的缺陷和错误，而是充分肯定它们在历史上的地位。这的确是难得的。唯其如此，他产生“简牋未修，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倏焉将坠”、“顾彼湮落，用深轸悼”的感慨，就是很自然的了。诏书提出的六代史及其撰者名单是：北魏史，萧瑀等撰述；北周史，陈叔达等撰述；隋史，封德彝等撰述；梁史，崔善为等撰述；北齐史，裴矩等撰述；陈史，窦璡等撰述。总的撰述要求是：“务加详覈，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

这次修史工作，一则由于有些撰述者相继调离或死去，二则由于缺乏组织工作的经验，故未能取得具体的成果，“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② 尽管如此，这篇诏书却透露出唐初统治者对于撰述前代历史的工作有一种宏大的气魄，从而为唐初史学的发展定下了较高的格调。

（二）唐太宗《修〈晋书〉诏》。

东晋、南朝（包括宋、齐、梁）时期，撰晋史者凡20余家（按习惯说法是18家）。这些撰述大部分在唐初还可以看到。但是，

① 《唐大诏令集》卷81，下同。本文所引三篇诏书，均同此，不另注。

② 《旧唐书·令狐德棻传》。

它们都产生于东晋、南朝分裂时期，在唐代政治统一的局面下就显得不尽如人意。因此，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在史馆已经修成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后，提出重修晋史的要求，并下达了《修〈晋书〉诏》。在这篇诏书里，唐太宗提出了“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的论断，对史学的社会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诏书还追述了从传说时期至唐初的史学工作，肯定了史学工作所发挥的“彰善癉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的积极作用。但是，诏书认为以往诸家晋史“才非良史，事亏实录”，说它们有的“烦而寡要”，有的内容空洞、“滋味同于画饼”，有的“不预于中兴”，有的“莫通于创业”，有的“其文既野，其事罕有”，等等；故而唐太宗“遐想寂寥，深为叹息”，要求史馆重修晋史。唐太宗对以往诸家晋史的评价未必都是恰当的，但他从整个史学工作的要求提出重修晋史的主张，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于是，以房玄龄为监修，领导《晋书》的撰述工作，当时同修者近20人，以令狐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①。贞观二十二年（648），《晋书》撰成，当时称为新《晋书》。《修〈晋书〉诏》的下达和新《晋书》的撰成，反映出唐初统治者对于历史的一种重新评价的要求。关于这一点，下文还要讲到。

（三）唐高宗《简择史官诏》。

谏官朱敬则曾上《请择史官表》，表中称引北齐神武帝对史官魏收说的一句话：“我后代声名，在于卿手。”又举北周文帝重视史官柳虬关于直笔的说法。最后提出应对史官人选进行严格的考察，指出：“董狐、南史，岂知生于往代而独无于此时，在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尔！”^②宰相韦安石读了这份上表，感慨地说：“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

① 《旧唐书·令狐德棻传》。

② 《全唐文》卷170。

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①史学家刘知几说：“至咸亨年，以职司多滥，高宗喟然而称曰：‘朕甚憎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择，如有居其职而阙其才者，皆不得预于修撰。”^②史馆“职司多滥”，正是朱敬则上表的背景，也是唐高宗于咸亨元年(670)颁发《简择史官诏》的原因^③。诏书是：

修撰国史，义在典实。自非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说正有闻，方堪此任。所以承前纵居史官，必就中简择，灼然为众所推者，方令著述。如闻近日以来，但居此职，即知修撰，非唯编缉疏舛，亦恐漏泄史事。自今以后，宜遣史司于史官内简择堪任修史人，录名进内，自余虽居史职，不得辄令闻见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国史等事。

这篇诏书跟前两篇诏书不同，后者是对所撰史书提出要求，前者则是对撰写史书的人提出要求。后世史家有所谓“史德”的说法，这里讲的“操履贞白”、“说正有闻”，其实就是史德。当然，在史德之外，也还必须有史才，这就是“业量该通”。诏书明确指出，凡不具备这种德、才的人，虽居史职，亦不可参与修史工作。这表明唐初统治者对选择史官的重视，反映了他们对待史官的看法在价值观念上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变化。史官地位的提高和史官受到严格的考察，这在当时是并行不悖的。

这三篇修史诏书，在对史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上，在撰述课题的制订上，在史学人才的选拔上，对唐初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可以认为，这是盛唐史学得以发展的政治上的保证，若没有这样的政治上的保证，盛唐史学或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① 《新唐书·朱敬则传》。按：《新唐书》记此事于武则天称帝之后，疑有误。朱敬则上表可能是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因而才有高宗的《简择史官诏》。未知确否，姑记此存疑。

② 《史通·史官建置》。

③ 《唐大诏令集》于诏书之末署为“总章三年十月”，当误。据《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史官》记，应为咸亨元年十一月。《史通·史官建置》云“至咸亨年”，可证。又，据《资治通鉴》卷201咸亨元年记，高宗于总章三年三月改元咸亨，故亦不当有“总章三年十月”。

二 纪传体史书编纂上的收获 和历史认识上的成就

盛唐时期的史学成果，首先是在纪传体史书编纂上所取得的重大收获方面。

“五代史”的撰述。上文讲到，唐高祖时曾下诏撰述“六代史”，即北魏、北齐、北周、隋、梁、陈六个皇朝的历史，但因种种缘故，这次修史工作竟不就而罢。唐太宗继位后，于贞观三年（629）复下诏撰述“六代史”。经史臣众议，认为北魏史已有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和隋代魏澹所撰《魏书》二家^①，“已为详备，遂不复修”，唯梁、陈、北齐、北周、隋五史当修。唐太宗表示同意，以令狐德棻修北周史，李百药修北齐史，姚思廉修梁史、陈史，魏征修隋史，以房玄龄、魏征为监修，以令狐德棻具体指导和协调诸史撰述工作。7年后，即贞观十年（636），五史俱成，为“五代史”。它们是：《梁书》56卷，《陈书》36卷，《北齐书》50卷，《北周书》50卷，《隋书》55卷，共247卷。“五代史”全为纪传而无书志，故亦称“五代史纪传”。“五代史”的撰成，唐太宗极为高兴，他勉励史臣们说：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絀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②

① 魏收《魏书》114卷（连同子卷共130卷），撰成于北齐天保五年（554），今存。魏澹《魏书》92卷，撰成于隋文帝开皇年间，已佚。

② 《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恩奖》。